

长江人文馆
Humanities

王水照 朱刚
——著

学者型传记典范之作

再现中国传统
士大夫偶像的心路历程

苏轼评传

名家名传书系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苏轼评传

名家名传书系

王水照

朱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苏轼评传 / 王水照, 朱刚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12

(长江人文馆. 名家名传书系)

ISBN 978-7-5702-1286-6

I. ①苏… II. ①王… ②朱… III. ①苏轼 (1036—1101)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4561 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责任校对: 毛 娟

封面设计: 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1 页

版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1 千字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

思想史上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普通人看来是单调乏味的。比如德国大哲康德，几无生平可言；中国大哲程颐，也以性格的固执、单调著称。他们的名字底下，是一套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奥、精密的学说，接近他们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学力。但也有另外一类思想家，如伏尔泰、苏轼那样的，生平多故，极富传奇色彩，兴趣广泛，性情开朗，为人们所乐于接近，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从之获益。因此，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闻讯围观，妇人孺子皆晓其姓名，文人学士珍藏其签名、手迹，录传其逸闻趣事，他们的学说也经常以极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的生活之中。我们对那些不顾尘嚣，寂寞创作的思想家深怀敬意，他们的学说是民族文化的脊梁，学术史上的丰碑；不过，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深受民众喜爱的思想家，他们的精神遗产，对于一般社会生活，尤其是对于后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响更为巨大深远，那是民族文化的血肉，与学术史的大地。

那么，为什么说“更应该注意”呢？以苏轼为例，可以说明之。

苏轼确实是那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甚至在他的生前，他的名字后面已经跟随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传说，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省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观、人生观而言），称他为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绝不过分。就此而言，历史上罕有人堪与相比。因此，苏轼的思想对于国人生命灵性的启沃，盖不在孟轲、庄周之下，而恐远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巨匠之上。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的著

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的是著见于文人学士的心灵。宋以后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中，无不有一个苏东坡的形象在——这是历史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是人心中的历史。然而，文献中的历史却另具一副面目。元明以降，追慕苏轼精神境界的不乏其人，但一谈道德性命，辄很少人会谈到苏轼。关于有宋一代学术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要数《宋元学案》，那其中本不乏与程朱理学相异的各派学说，一一列为“学案”，却偏将苏氏“蜀学”与王安石“新学”另列为附录，其意该是视为异端。“新学”“蜀学”本来至少可与程氏“洛学”并峙，却因南宋人将北宋灭亡之故归罪于王安石，而讳言“新学”，又徒以朱熹尊程贬苏之故，而讳言“蜀学”，这无疑出于偏见。可是，在“五四”以后，程朱理学的权威意识形态之地位已经推倒，哲学史界对“蜀学”的研究却仍远逊于对“洛学”的研究^①，遑论给予恰当的评价。这种情形，与苏轼对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是很不相称的。

当然，造成这个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苏轼的思想确实比研究程颐这样单纯的哲学家要困难。程颐的固执、单调令一般人敬而远之，但其学说几乎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思辨的领域，旁涉其他经济、文学、艺术、史学、医学等诸方面的很少，其辨析概念相当精深，体系比较严密，对于学者来说，倒易于追究。而苏轼则相反，虽被各式人等喜爱，所谓“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②，但真要全面把握他的思想，却实属不易。他对于抽象思辨的兴趣固然也很浓厚，其水平也并不在程颐之下，但他在各种具体的事物规律的寻求方面，在诸多文化领域内所体现的智慧，更足重视。我们只要稍接触苏轼的文字，便不能不为其中涉及领域之广泛，和其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所震撼。不仅是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之间，不仅是对“道”“性”等形而上概念的追究和持续不断的

^① 近年开始出现研究“蜀学”的专著，如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宋代蜀学研究》等，是可喜的现象。

^② 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语，《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人生思考，也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史学、文学、艺术等各大领域的丰富言论，而且在医卜星相、炼丹行气、美食养生，及农耕工艺技术、教育心理等，几乎凡我们想得到的话题上，他都曾发表见解，这博杂的程度是研究者极难追踪把握的。但这般天花乱坠的风貌，却印证着苏轼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实解悟，其中要旨是我们应该探究的。

惟其影响虽大，而研究却薄弱，乐之者虽多，而把握却不易，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更应该注意研究苏轼这样的思想家。他的影响是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又广推到各种文化领域，因此，苏学不是以严密的概念系统构建起一座丰碑，却是以坚定而又洞达的智慧求得人生安身立命的大地。研究苏轼和他的学说，对于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与此相关的是，苏学比诸那些严密的哲学体系，更少闭门造车的成分。据说有一个德国教授为学生讲解柏拉图的学说，只说一句“从前有个叫作柏拉图的人”，接着就进入学说的剖析，了不涉其时代与生平。倘用此法研究苏学，则无疑是竹篮打水。苏轼不是把全部思力贯注于概念推导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如水银泻地一般，贴近自然事物、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所提供的各式事业舞台。鉴于此，我们在剖析其学说之前，必须详述其生平，在述其生平之前，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

一、宋代文化的鼎盛局面

在中国古典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和此后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古今学人在论述唐宋时期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时，心目中早就隐然有了一道分水岭。在社会政治方面，对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起盛衰亡作研究时，唐代就会被认作这两种选官制度更替的时期，而宋代则意味着这更替的完成；在学术思想方面，所有的论著都会把汉唐经学与宋明道学区分开来，并且对于这种区分，宋明道学的创造者们是

非常自觉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情形更觉明显，我们所谓“国画”，是从宋代算起的，通俗文学是宋代开始全面兴盛的，即就雅文学而言，词是“宋词”不必说了，骈文与古文之间主导地位的交换，也在中唐至北宋期间完成，诗则有著名的“唐宋诗之辨”，“宗唐”与“崇宋”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以后也不会断绝。几乎在所有文化门类上，唐前与宋后都存在这样直观的区别。

客观存在的这道分水岭，引发着史家对于它的思考。文化是人创造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人力不能回天的情形，但历史人物的自觉创造仍是主观方面的动因。以故，考察唐宋文化转型之现象的时候，史家的眼光会很自然地注视在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古文运动及其领导者韩愈的身上，陈寅恪先生说：

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按韩愈字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之人物也。^①

这是一段大文字，肯定赵宋以降是文化史的“新局面”，而以韩愈为开启者。北宋文化人对于韩愈的继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烦细述，兹再引述陈寅恪的另一段文字：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②

此段对宋代文化的“新局面”更加以推崇，除以韩愈为先驱外，更指欧阳修为基本奠定之人。两人之间相隔二百多年，几代文化人前

①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仆后继的自觉创造，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欧阳修的继承人苏轼，正是将此局面推向高潮之人物。

那么，如何认识宋代文化的这个“新局面”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四种可资参考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把宋代认作“近世”的开始。这是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创见，他断言：

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①

所谓“中世”和“近世”，本是西方史学界流行的概念，他们把希腊罗马时期称为“古代”，把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时期称为“近世”（或“近代”），而其间由教会文化统治的时期就叫作“中世纪”。照内藤的说法，中国在宋代就开始了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文化，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就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平行和等值的发展。^②

欧洲文艺复兴以复兴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为口号，中国从中唐至北宋的儒学复古运动、古文运动也以复兴古代儒家文化为口号，而皆通过“复古”以创造新局面，从这一点上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学界已深入为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年代的探讨，论点更为纷纭，一般皆不同意遽认宋代为“近世”，但这个意见对于我们观察宋代的文化，是很有启示的。

第二种意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作通盘的把握，从而认为宋代是其发展的顶点。王国维说：

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②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①

陈寅恪先生说得更明了：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

他的学生，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也秉承师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③

这几位学术大师对宋代文化的一致评价，很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宋人如朱熹也早自有“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④的赞语。虽然今天的行文习惯对于“造极”“空前绝后”等绝对化的词汇不易首肯，但我们后辈学人其实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直觉表达中所蕴含的对表述对象的深层把握，因为那是以深厚的学力和文化的濡染为基础，在知识与感受的高度统一上得出的。对于这样的意见，我们不能仅仅在知识方面追问论据，而须对另一方面更加关注：为什么宋代文化会给予那些受传统文化熏染极深的学人以这样的感受？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④ 朱熹《楚辞集注》附《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影印宋端平本。

第三种意见，是通过对比唐、宋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概括宋代文化的特征，从而有“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对举区界的说法。据我们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傅乐成可能是此说的首倡者。他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点是：

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

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①

他提出从类型上来探究唐宋文化各自特质的命题，是颇为精警的，可以说是综合了前两种意见所提供的启示，而把研究引向具体、深入，因此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纷纷回应。在他用“复杂而进取”“单纯与收敛”来分别概括两种文化精神以后，不少学者进一步加以发挥，形成了一系列对于宋型文化的比较流行的看法，如谓“唐代士人勇于进取，宋代士人能收敛形迹，淡泊自甘……宋代文化是属于收敛的一型”^②，或谓唐型文化“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而宋型文化“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③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若把宋代文化相对于唐代文化而显出的某些特征，认定为宋型文化本身的性质，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常见的以“单纯性”“封闭性”来描述宋型文化，便很可商榷^④。

综合以上三种意见，我们认为，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① 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4期。

② 罗联添《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差异》，《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0年。

③ 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下编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质变点。对于前代来说是新型的；对于后世来说又具有近代化的指向；就其自身而言，则是一种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范式，给人以一种文化“造极”的感受。这三个方面，呈现出动态的统一，是一性而三相。

在说明了我们对于宋代文化的基本认识后，还有必要引述一下第四种意见，即宋人自己对于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的体认。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

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①

王十朋《策问》：

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于正（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②

许尹《黄陈诗集注序》：

宋兴二百年，文章之盛追还三代。^③

这些都是把宋代文化与“三代”，尤其是“成周”相比拟。此种自我体认，似亦被后世的不少人认可，元代官方编《宋史·艺文志序》云：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② 王十朋《梅溪文集·前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③ 任渊《山谷诗集注》卷首，《四部备要》本。

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①

明代方孝孺亦有诗云：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②

都认为宋代文化可与周代相拟。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西周的礼乐文明即以周公“制礼作乐”的名义记载在经典里的社会蓝图，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最高理想。这样，说宋代几乎达到了“成周之郁郁”，也无异于说宋代是文化鼎盛之世，与我们对它的“高度成熟”的认识，只是表达上的不同。但继述和复兴两周之盛的文化，这一种表述，却正好与儒学复古运动、古文运动所要达到的理想相一致，等于是肯定了这理想的实现。在我们看来，这是文化发育定型的一种范式，在宋人的自我体认中，却正是他们召唤和践履周、孔之“道”的收效。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是并不奇怪的，在古代史上很多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形。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已从以儒学为权威的传统意识形态中跳出的缘故，我们自无必要重新钻进去，迁就古人，但仍有必要了解古人的自我体认，那意味着，宋代文化的鼎盛局面，是宋代士人自觉创造的结果。

宋代政治体制的成熟、经济的发达、道学的勃兴和文艺的繁荣，自有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从客观方面可以探究和说明；但从历史人物自觉地召唤和创造盛世的主观方面来说，则韩愈以后至苏轼以前，儒学复古运动和古文运动确已呈现波澜壮阔的局面，儒者秉其文化理想积极干政的行为也已形成激励人心的风潮。尤其是在宋仁宗登基（1022年）以后，社会的上层人士觉得形势极好，有了文

① 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方孝孺《谈诗五首》之二，《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

化复兴的良机，如欧阳修在《本论》中所说：

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①

他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认识可能是过于乐观的，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前景的展望，对创造这样的文化盛世的急迫心情，却跃然纸上。

古往今来有很多有志之士，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躬逢盛世，所以，当面临的时代给予人希望的时候，有志者更应当努力去做。儒家知识分子大多是有拯世济民的热情的，虽然儒学对于统治者、执政者的配合倾向一般大于批判倾向，但真的要求一个社会能达到儒家的文化理想，亦谈何容易！因此，一个儒者只要守护着他的理想，不希世苟合，不背叛自己的道德原则，依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去积极行事，那么，他总能对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苏轼笔下的王禹偁便具有这样的精神：

方是时，朝廷清明，无大奸慝，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②

王禹偁不仅仅是欧阳修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人格形象是具有整个文化史的意义的。苏轼笔下的欧阳修也是这样：

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著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③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② 苏轼《王元之画像赞》，《苏轼文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③ 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故天下翕然师尊之。^①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身系着华夏传统文化之命脉的巨人。王禹偁和欧阳修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苏轼笔下，那不啻是告诉我们，苏轼在历史舞台上具有何种使命感。不妨重复说明一下，此种使命感与宋人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体认是一致的，而我们所认识的宋代文化的鼎盛局面，就是在这样的自觉动因下创造出来的。当然这里也就呈现了苏轼与他所处时代的密切关系。

二、从“祖宗家法”到“庆历新政”

文化盛世的总体风貌固然召唤、激励着文化巨人，但真正塑造着他的还是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各具体领域内的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问题，给人的印象不全是乐观的，有的还相当尖锐，令仁人志士为之流涕太息。这里先谈政治上的问题。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政体的成熟形态。这一政体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以其在中国的情形最为典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大都曾设计过围绕着君主来构画的社会蓝图，到汉武帝的时代，确立了儒学意识形态与君权的统一，奠定了中央集权政体的基本模式，史称“汉制”。“汉制”以后比较突出的有“唐制”。汉唐之间是这个集权政体发展的前期，其间包容了士族门阀制度产生、发展和瓦解的全过程。取代门阀制度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唐代已甚有发展，以科举取士为来源的文官体系也渐趋形成。科举取士和文官体系是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政体实施运转的成熟定型的方式。但它们的对立面，门阀制度的遗留和军阀割据势力的猖獗，致使“唐制”成为某种制衡的手段，一旦国力衰落，制衡便降

^①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同上，卷十。

为调停，再降为以中央的名义委屈承认现状，然后中央便进入苟存的状态，直到完全灭亡，任由军阀们混战取代，进士和文官成为可笑可鄙的东西。宋朝本身也是由军阀建立的，但为了不再被别的军阀取代，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他们相继剿灭了许多割据政权，统一天下后，便用“杯酒释兵权”的巧计解去了武臣的兵柄；用庞大的禁军来养兵，收罗了社会上容易啸聚“作乱”的无业游民，并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派遣文臣带京官衔外出，取代军人掌握地方行政，并设置通判一职，来牵制和分掌地方官的权力；又任命发运使、转运使掌握各路的财政；在中央政府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枢密使掌兵，三司使理财，分散宰相的权力；完善科举制度，大量增加进士科录取名额，用来培养文官体系；定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以鼓励士人来参与政治活动；还使文臣纂修《太平御览》等书，加强“尚文”的风气……这一系列措施，在宋代被称为“祖宗家法”，即太祖、太宗定下的老规矩。通过这个“祖宗家法”，政权、财权、兵权及意识形态都走向集中，君主独裁得以实现，使宋代成为中央集权政体完备成熟的时期，也即进入了其发展的后期阶段。

君主独裁的实现，标志着专制统治的高峰时期，专制的对立面——民主的因素，便会在这个时候被孕育出来。因此，在欧洲，君主独裁的出现便预示着“近代”的到来，也正因此，内藤湖南把中国宋代集权政体的成熟认作“近世”的开端。但在中国，这个制度不像欧洲那样建立不久即走向崩溃，而是在宋代以后还维持了非常长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维持得如此长久呢？只能说，宋代建立的这个专制政体的成熟模式有着制衡矛盾的张力，即把专制政体的成熟阶段必然产生的对立面——民主的因素，长久地妥善安置在体制的内部。所以，我们还试图研究“祖宗家法”如何能够在完善独裁政体的同时，统一着民主的因素于其内部。这民主的因素，尽管仍被统一在集权体制之内，没有能力突破它而真正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但毕竟是一种指向着“近代”的因素。

所谓民主，其实现的方式无非是参政权的开放、分权、政党诸

端。在宋代的政治结构中，有一系列出于集权目的的制度，却奇妙地包含了指向这些方式的因素。

首先是源于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用它来取代法定世袭的贵族特权制度^①，本是为了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上，但它却使社会等级中君与民之间的那些等级变得灵活，理论上不承认有与生俱来的特权阶层，这就基本上向全体士民开放了参政机会。虽然参政等于是为皇帝效劳，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高于皇帝个人，故文官制度所蕴含的政权开放的因素，值得充分估计。这里引证两个数字以资说明。一是科举取士的数目，据统计，北宋一代开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进士 19281 人，诸科 16331 人，合计 35612 人，如算入特奏名及史料缺载的，则总数约为 61000 人，平均每年约 360 人。^② 这不仅比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所不及，可谓空前绝后。并且，由于在考试制度上实施了封弥、糊名、誊录等杜绝作弊的办法，使科举取士尽可能地成为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让那些没有请托之路的孤寒之士凭才华和努力得以入仕。二是布衣入仕的人数比例，据统计，从《宋史》有传的 1533 人的材料来看，两宋以布衣入仕者占 55.12%，比例相当高。^③ 若从臣僚中最高级的宰辅大臣来看，唐代仅崔氏就有 23 人入相，占唐代宰相总数的 1/15，说明世族仍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势力，而宋代宰辅中，除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身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苏轼的家世也并不十分显赫，但他却是一位重要的大臣，其弟苏辙更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① 宋代虽然仍有荫子制度，但荫官级别很低，只享有照顾的待遇，不能继承权力，除非他自己有能耐爬上同父辈一样高的官位。不过，由于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宋代数世显宦的家庭还是不少的，但制度上没有给予世袭权。

② 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 2 卷。

③ 陈义彦《从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第 9 卷第 4 期，1977 年 11 月。

其次，宋代为了实现君主独裁，采取了限制和分割相权的制度，不但令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涉，而且就在中书内，亦采用唐代群相制的办法，任命几个官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俗称的“宰相”，轮流值日（独相的情形很少见），更换频繁，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掌事权。这当然不能完全取消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但确实令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不过，国家机器的实际运转毕竟要由政府来操作，对相权的分割同时也造成了权力的分散，使得宋代的政府颇像一个由几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内阁。另外，台谏和学士院都有议事权，起草诏制的中书舍人和颁布诏制的给事中也有封驳的权力，而宋代任这些职务的官员经常把这种权力运用来争取政治的民主化，甚至不惜得罪皇帝、宰相。这样，只要做皇帝的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则分割相权颇有民主效果。与此相应的是，宋人的议论也经常借推尊皇权来争取政治民主，表面是在赞美独裁，实际的意图却在摧垮事权的集中，以保障各人的议事权，这是我们在阅读宋人的文字时应当时刻注意的。

第三，宋代文官体系的成熟，使得官员任用方面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即以离朝外任的办法来处置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没有得“罪”，政见不同的官员得以原来的品衔出任地方官，并且也不影响他在品衔上的晋升，因为考核其绩效的标准相对于朝廷一时的政策有着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出朝的官员仍保留参政的资格，等待中央情势有变，他立即可以回朝施政。这个不成文的制度，促成了宋代政治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党争”现象，并且使“党”建立在一定的政见的基础上，使它颇具近代政党之萌芽的色彩。北宋“党争”中的各党领袖如吕夷简与范仲淹，王安石与司马光，各为政见相争，却并不影响私交。在理论上，他们有的公然亮明了“君子有党”的正当和必要^①，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性，也有启迪未来的意义。

如上所述，宋代政治中指向着政权开放、分权和政党的这些民

^① 参看欧阳修《朋党论》，《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